


·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

MA CHI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当代文论

马 驰 /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XIFANG MAKESIZHUYI YU ZHONGGUO DANGDAI WENLUN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论

马 驰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论/马驰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9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9-0256-8

I. ①西… II. ①马…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中国 IV. ①B089.1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5648号

责任编辑 张珊

责任校对 冯田芳

封面设计 马龙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690mm×960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295千字 定价 34.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探询和研究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

——写在《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付梓之际

如果我们对 20 世纪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理论做一个“盘点”，不难看出，其最有贡献的研究领域当属文化理论；同样，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为人类做出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也在文化理论。因此《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首先把目光投向 20 世纪西方重要的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成果，并以译介和研究上述理论为本丛书的首要目的，这是因为，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试图用马克思的原理和当代伟大的思想成果，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中，既有马克思的原理部分，又有当代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还有面向现实的维度。这种理论结构与我国新时期的理论走向非常一致。新时期文学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指导下，在对西方当代思想的合理吸收、对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再度发掘等综合因素的整合之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正是由于有上述相同或相似的境遇、动力因素和理论结构因素，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在热点问题的提出、争论的发生、某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的文化理论有似曾相识之处。

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抱着完全否定的观念研究西方新左派和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理论工作者的忧虑,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张力与武器。不过,此时理论界的动力与武库并非仅此一个,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原则和理论上根本差异,但这两种思潮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交叠重合处也很多,在我国,理论界几乎是同时在使用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武器,而并未感到有重大的区分和不便。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两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拥抱后现代主义,这就是我国理论界的现状,这也就是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的意义所在。

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革命运动低潮的产物,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西方社会自觉的或被迫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西方各国大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身处这种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变革家,再去发展一种经济危机及其爆发的理论,再去制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既无紧迫性,也无实际意义。但是,现代化社会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毫无问题,从马克思的原始出发点——即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看,现代发达社会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却在人性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从主观上想坚守初衷不变,还是客观上形势使然,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们的深刻和执着,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作为一种(在否定的辩证法这种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是相契合的。

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20世纪国外左翼学者所倡导的文化理论毕竟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建构。本丛书通过对国外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辨析,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原点问题展开富有新意的研究,这对我国学术界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作为整套丛书,既有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有国内学者的研究心得;既有译著,也有专著;所涉猎的研究领域包括文化身份、社会心理、大众传媒、互联网、广告、青年与妇女问题等热点问题,涉及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

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巨大的社会变革也引发了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乃至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或伴随现象加以监督,做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由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它的批判理论必然成为人们寻求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解放的思想武器。因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知识界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化,乃至哲学、社会思潮的层面,而迈向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我们有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必要,这也是编辑本丛书的初衷。

愿这套丛书为国内学术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引 言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是指由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总结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寻找一条适合西方革命和人的解放道路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思潮。以后这股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思潮又逐渐影响到文艺理论、美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并且至今还在产生着影响。

我国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人物和早期著作并不陌生。早在 1940 年 12 月,胡风就在他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了吕荧所译的卢卡奇的长文《叙述与描写》。在此之前,他已经根据熊泽复六的日译本翻译了卢卡奇的《小说的本质》(现通译为《小说理论》)的一部分,并有机会接触《左拉与现实主义》等卢卡奇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他以自己敏锐的理论视角注意到了卢卡奇等人的思想火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在我国是作为修正主义思潮加以批判的,即便是经过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时期,当我们可以重新理性地探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时,我们还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谓地讨论着“西马非马”等一类似是而非的问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难以定性”。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一社会思潮呢?

首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看,它反映了在不同于东方社会条件下,西方共产党、党内外一批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战”后,共产国际在西欧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运动,西欧各国按俄国革命模式进行的革命相继失败。对此西方共产党和党内外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反思。葛兰西指出:同俄国相比,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较发达,其统治不仅仅依靠暴力,而且还通过市民社会,用意识形态来削弱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

于初生而未成熟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存在相适应的关系，国家一旦动摇，市民社会强大的堡垒立刻显现。国家只是前沿堡垒，它的后面有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的体系，在西方其统治是总体统治。与此相应，西方革命模式也应是总体革命，而文化心理革命是经济革命的前提和基础，西方由此而建立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可见，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对西方革命显得尤其重要。对此，恩格斯晚年曾经指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 50 年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在哲学理论上强调主体性和辩证法，把理论的主题转向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不能因为他们思考、研究的问题不同于我们，不追寻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断言他们在重新设计和反对马克思主义。

其次，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看，“二战”后，由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结构和危机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和古典资本主义不同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1）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融合”更加紧密，它们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减少经济危机的损失，共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2）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分成日益复杂的阶层和利益集团。白领工人比起蓝领工人，有较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其生活方式与传统产业工人也有明显的差别，再加上西方国家战后的社会再分配和福利、职能的发展，西方社会普遍贫困化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由白领阶级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一方面求稳怕变，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科技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西方社会出现了“白领失业浪潮”，这对他们产生了较大的精神压力。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的取舍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3）由于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工人和整个社会在资本主义高生产、高工资、高消费的引导下，社会向消费主义方向发展，产生了非政治化倾向，再加上西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 607 页。

意识形态作用的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淡化、弱化。(4)由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对自然的过度开采,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享乐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生活方式,也给人才带来了严重的精神问题,生态问题和精神问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突出难题。而社会生产一体化、整体化趋势和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当代西方表现得尤其突出。

上述问题不可能不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探索,其理论形态和理论主题势必会同处在东方的我们,也同马克思、列宁的时代有所差别。由于西方社会的上述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把他们理论关注的焦点转到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上。正如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 and 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理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的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①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这种转换,我们应结合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予以科学的分析。特别不能因为他们的理论主题不同于我们过去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甚至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就认为他们由于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是在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因而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转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是完全合理的。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正处于它的早年时代,其统治主要是依靠暴力,且处理政治、经济危机的能力相当有限。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导致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马克思、恩格斯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给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的理论重心从哲学转向经济和政治学上。而“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加了资本主义

^①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69页。

发展的活力,资本主义应付事变的能力和技巧日益成熟。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一套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并从中输出其意识形态。使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消费,在全社会造就了一种和人类自身真正存在无关、让人放弃自由渴望的“虚假需求”。可以说,西方社会对人的统治是全面、总体统治,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越来越强。它使得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工人阶级有较大的影响,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它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工人阶级只有把在经济生产、生活中和资产阶级产生的矛盾冲突,通过政治批判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才能最终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前提条件。再加上当代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化和重组,使西方革命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这一切说明西方革命要取得成功,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至关重要。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转换正反映了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寻求人的解放之道的探索和努力,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坚持辩证法的必然结果。只有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历史条件,才能对他们的理论做出科学的评判。由此我们可看出,那种脱离西方历史文化特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来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得不出科学和客观的结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在不断发展和变革中的社会思潮。它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有着众多的分支和流派。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看,其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20世纪20~40年代。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初创时期,他们的研究主要探寻了西欧革命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他们把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产阶级缺乏足够的主观精神准备,从而产生了阶级意识的危机,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由于第二国际右翼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庸俗的机械决定论的片面理解,也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产生的物化意识的影响。于是,他们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哲学理论的重点是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强调主、客体相互

作用的总体辩证法,强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人。他们或是党内资深的理论家或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一时期的西方共产党除意外,由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教条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指导思想束缚,他们的革命理论、革命策略、哲学理论基本上照抄照搬苏联,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2. 20世纪40~60年代。这一时期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有:(1)20世纪30年代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人、人本主义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2)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西方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起来革命走向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反倒赞成法西斯的极权统治,西方马克思主义侧重于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揭示其根源。(3)“二战”后,新技术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活力,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有较大的提高,出现了蓝领和白领工人之分,工人阶级和西方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分化。资本主义统治方式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职能从暴力统治向意识形态统治转换,他们除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外,更多地是通过控制工人阶级的意识,使工人阶级认同资本主义统治的文化秩序、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不断弱化、淡化。此外,由于科学技术对人的总体控制不断加强,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社会发展的整体化、一体化趋势和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的培养、革命力量的分化组合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他们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扩展到对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批判。这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个人崇拜、高度集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苏共二十大”后,西方共产党开始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西方,探索西方革命的道路。他们相当重视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结合西方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他们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主要在于,他们仅把议会民主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要求把政治革命纲领和经济革命纲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

地位,其特点是提出了一系列的革命纲领和策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阵营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出现了南斯拉夫“实践派”、东欧新人道主义思潮、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其理论关注点是“人和实践”的问题;与此相反,阿尔都塞既批判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长期存在的以政治实用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贬损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做法,又反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做法,要求正确地处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密性和独立自主性。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从不同侧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发展。

3. 20世纪70年代至今。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的主要因素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促进了社会发展,但也给人类带来了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取向的改革,苏、东剧变,给予西方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视点。前者产生了以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高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他们把生态问题的解决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同资本主义制度的解决联系起来,把矛盾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部分西方学者,如柯亨、威廉姆·肖等用当代分析哲学的方法和范畴来分析、规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学理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如约翰·罗默则在反思了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用市场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在实现生产的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基础上,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作辩护。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全球化趋势也进一步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他们的理论体系还会随之进一步发生转换。1994年美国学者奥尔曼访华,介绍了十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1998年巴黎第二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以“资本主义:批判、斗争、抉择”为题,对全球化时代当代资本主义的走向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做了进一步探讨,它们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最新思考。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仍在发展过程中。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既反映了西方共产党、工人党及其党内理论家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

西方的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西方文化传统,探索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也反映了西方进步学者明确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概念、方法来分析这些问题,寻求西方人自由、解放之道。前者力图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后者则根据自己的兴趣侧重于理论研究,其弱点是受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理论中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较严重,但他们思想活跃,对马克思主义大多抱着严肃的态度,他们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西方社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绝不能简单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部分,先入为主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加以论述和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社会变革的大潮,学术界重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但面对这一复杂的社会思潮,学术界对其评价却十分复杂,激烈的讨论从未间断过,讨论中的分歧和争议主要集中在:

1. 对卢卡奇及其《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评价问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创者,卢卡奇究竟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是20世纪的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则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分歧显然与对他的关键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评价密切相关,这种评价并且直接关系到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认识,甚至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重大争议之源。自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于1923年发表以来,对其理论性质和主导倾向的评价,国际上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持基本肯定和赞扬态度者认为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而持基本否定和批判态度者,则把书中的基本观点确定为“理论修正主义”或“黑格尔主义思想之大杂烩”。国内有的学者把书中的某些“偏颇”和“失误”看做“瑕不掩瑜”,“根本无法遮掩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有的学者则认为书中的思想“构成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的挑战”,“其基本倾向是错误的、影响是不好的”等等。造成这种分歧的重

要原因在于凭借的理论尺度不同,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卢卡奇的否认自然辩证法、批评反映论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而从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则认为卢卡奇强调主客体关系和改变现实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本来思想的恢复和发扬。但是,即使都声称凭借实践唯物主义的尺度,由于理解的不同,也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评价。比如,一派认为,卢卡奇要求对人类社会生活做整体、全面的理解,即不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而是将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突出了人类活动的实践性、社会性和高于自然历程的特点,因而贴近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另一派则认为卢卡奇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忽视了“第一自然”的前提,否定自然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社会哲学,而且卢卡奇的实践概念不以劳动为基础,还把实验和工业排除在外,并在最后归结于意识,因而不能说成是实践唯物主义,而只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总的说来,与国际上的“卢卡奇热”相似,国内对卢卡奇的研究和评价也有一种从贬到褒、从否定到较多地肯定的趋势。然而,《历史与阶级意识》究竟树立了一面什么旗帜?卢卡奇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对日后思想界究竟起了什么影响?它的理论思维的主旋律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并未明确解决的问题。

2. 怎样认识和估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是多次争议的焦点,大致有三派观点:

(1) 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2) 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至就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

(3) 认为不能先入为主或一概而论地笼统定性,应当就不同派别、不同代表人物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点,分别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评价。

第一派观点的主要论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实行与西方哲学中某个唯心主义流派的结合,主张一种折衷混合的世界观;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否认自然辩证法、批评反映论，提出了一条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哲学路线；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人本主义学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了，否定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因而与历史唯物主义无缘。后两派观点反驳前者的理由主要是：(1)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时，正值西欧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一些代表人物和理论观点又在共产国际和所属各国政党内受到排斥和批判，经常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很难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由于所受传统教育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方式的局限，不少著述的内容和语言表达也确有晦涩难懂的一面，但这种思潮没有失去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敏感，而能对重大历史事变做出积极反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探讨，一批又一批地出版专著。其中不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揭露、对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批评，还是对科学技术发展、现代生活中种种问题的分析以及新的战略、策略主张的提出，都正是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历史实践的某种结合。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研究和吸取当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部分或因素，并不等于主张折衷混合的世界观，而正说明他们没有使马克思主义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相脱离，这种工作和成果即使发生偏差和错误，也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借鉴。(2)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否认自然辩证法、批评反映论的倾向，突出地表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不同路径和自身分化。这种倾向在理论上不免有所偏颇和失误，但也提出了某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和可资借鉴的因素，如体系结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辩证法的分类、实践观与反映论的关系，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各自的思想特色和差别问题，等等。(3)这种思潮中的人本主义学派力图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历史哲学，突出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活动，从各个角度发挥了人学，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有偏离唯物史观的倾向，但每个派别对科学技术发展负效应的揭露，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考察，对人的心理因素和微观领域的探索，对个人问题、人的价值和个性的研究，可能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比较忽视和薄弱的方面，因而也值得认真考察和借鉴。

3. 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哲史的研究对象，应不应当纳入马哲史的研究

范围？主要有三种观点：

(1)根本对立、应予排斥论。认为这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列宁主义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虽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虽有某些可以借鉴、吸取的合理因素，但首先应当正视它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对立。长期以来，国内的多种马哲史教材或专著中不提这一思潮和派别，或只作为批判材料涉及，也正是这种观点的表现。

(2)区分主流、支流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必然呈现一源多流的状况。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演变过程中的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理论的源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思想流派必然有主流、支流、逆流之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未形成主流，也不可简单地归之于逆流。这一思潮的不少代表人物是潜心研究和有所作为的理论家，从当代西方的社会现实出发，以新的视角和方法，突破了第二国际和苏联的理论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某些有价值的探索和贡献，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支流，是马哲史的一部分。列宁主义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主流，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是支流与主流的关系，既有分歧和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促进和借鉴的一面。

(3)当代哲学分化论。认为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不同脉络的分化和多样化的格局。一般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有三种：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更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这种分化和多样化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内在差别，人类历史实践（社会历史条件）的重大变化。多样化在理论上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创造本性和马克思学说的内在生命力，在实践上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重建和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局面。因此，马哲史的研究应当破除唯一“正统”的固定观念，突破直线和单线发展的思维模式，正视马克思主义分化和多样化的历史事实，从而以更加

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如果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学术界真正开始有系统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算起，20 多年的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80 年代中，初步进行介绍和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所以引起重视，并且比较全面地被介绍到国内来，显然与真理和实践标准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相联系。不过，应当看到，这时候国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掀起的高潮已基本回落，而且在我国舆论界的主导方面，由于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传统观念出发，最初一般是把它看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潮，或称为“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思潮，总之，多半是指责它歪曲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出了种种挑战，当然，这种状况随后不久就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个阶段影响比较大的著作，除徐崇温、杜章智等的著作以外，英国新左派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中译本已于 1981 年出版。《探讨》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囊括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扩展了最初由柯尔施(Karl Korsch)提出，后来由梅劳-庞蒂(Merleau-Ponty)进一步阐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近 20 年来国内基本上是沿照这个扩展了的范围来讨论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有评介性的著作出现。杜章智编写的《卢卡奇自传》于 1986 年出版，由于比较广泛地收集、翻译了卢卡奇的一些自我批评和自述的材料，因而也增强了读者和研究者的兴趣。

2.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末期，热烈展开讨论和争议。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和学术、文化领域“双百”方针的提倡，当人们较多地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实际内容后，就对原有的某些比较简单地定性和批驳提出了质疑。1986 年 8 月在长春市召开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学术讨论会，会上发生了不同观点的交锋。随后在 1987 年和 1988 年，国内理论界就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发表文章数十篇，争论焦点在于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它与传统马